

向云驹 著

文化记者的双刃剑

文化记者的双刃剑

宁夏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文化记者的双刃剑》一书精选了青年学者向云驹长短不一的文章 60 余篇。有新闻体裁，有杂文随笔，有文艺评论，有学术理论。作者对文化艺术多种门类、多种现象、多种专题进行研究或议论，视野宽阔，议论精辟。文章里大多都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和理论透视，文笔也颇有功力。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大多都产生过较大反响。许多作品获过各种奖项，《新华文摘》、《文汇报》及其他报刊多次给予转载。这是一部有品位和特色的文化文集。

序

高占祥

青年学者向云驹将他的又一部书稿拿来让我过目，并嘱为之写序，这是他为文十余年来的文章精选，所涉广及理论、学术、艺术、杂文、新闻、文学，冠之以“文化”名下，正是我所乐于关注的话题。长期在文化战线工作，使我养成了对文化问题的浓厚兴趣，也作了一些思考和研究，没想到会在一些青年学人中产生共鸣。向云驹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多年来养成了一种见了有文化字样的书就买就读的嗜好，并常写一些读书笔记和书评。有一次，他用笔名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评介我的《处世歌诀》和《人生宝鉴》的文章，结果一些青年大学生通过报社的编辑找他求购以上两书，事情又辗转到我这里。这时我才知道他把我的书仔细琢磨过一番。我又送了他我的别的著作，不久他又发表了那篇颇有影响的综论。我在文化部工作了十年，我喜欢边工作边思考，对文化艺术、文化政策、文化管理、文化体制、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经济、文化工程等都作过认真思考并发表而为文。这种思考不可能是纯粹学理的，而是从工作出发，但又包含着许多理论与学术的成分。要评说我的这些思考成果，不了解我国文化发展和管理体制的现状，仅用一般理论和学院

式眼光，是难于下手的。向云驹的综论表明他是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已收入本书的这篇综论发表后即被《新华文摘》转载，我的关于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可。我也因此发现向云驹在文化评论和学术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他从事过很专业的学术研究，出版的专著《中国少数民族原始艺术》填补了该学术领域的空白。本书中选收的有关原始艺术文化的个案研究，表明他在艺术史、文艺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美学等方面有较广博的知识。他的杂文、文学评论、文艺批评、文化新闻获过多种奖项，并被许多报刊转载。本书所收文章不但涉及的领域广泛，而且体裁多样。既有轻灵的杂文随笔，也有厚重的学术理论研究；既有随意的学者访谈，也有庄重的评论员文章，显示了作者写作的多方才能。

《文化记者的双刃剑》荟萃了向云驹在文化这个大领域里从事的多样而有特色的代表性文章六十余篇。读了使人感到别致、新颖、深刻。

首先是文集具备独特的文化视野。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文化内涵博大精深的国度。文化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文化的表层现象丰富多样，各种各样的文化都有它独特的价值。文化也可以视为各种社会现象的深层背景和深刻内涵。把我们多样文化的独特性和社会现象的文化根由找出来，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参照与推进器。有这样一种文化的眼光，是值得称道的。本书作者广泛地接触和探讨了文化问题，有服饰文化，有青铜文化，有东方人体文化，有艺术文化，有饮食文化，有民族文化，把我们带入一个文化的万花筒中，展示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分析了文化的正负效应，动力和堕力，传统与现代等，具有知识性和思想性。同时，作者又与学者们广泛地研讨了文化与经济、科学与

文化、艺术与文化的深层关系等深奥问题，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思想天地，给人颇多启示。作者的杂文随笔，也集中选收了以文化为题材或视角的作品，其文化言论新颖活泼深刻。至于文学艺术评论、文化学术和文艺理论研究，都可以说是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

其次是文集的新闻性。

向云驹从事文化新闻工作多年，在此期间的文章，多能见出他新闻职业的眼光。书中许多文章的选材新颖别致，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据他本人说，很多作品采访与写作过程的确感受着强烈的新闻冲动。尽管书中新闻体裁不多，但那些杂文、访谈是可以让人感到作者的新闻敏锐和新闻眼光的。当然，在较宽泛的范围上，它们也是新闻体裁。这种新闻的眼光在他的评论辑和研究辑中也随处可见。这倒启示我们，新闻眼光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的专利。广泛地接触生活，从司空见惯中找出非同寻常所在，从细微处见精神，由小及大，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样一些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和手段，是好的新闻记者的职业特征，也是做任何工作都需要的。向云驹认为文学与新闻共同追求的是“发现”，他把自己的选集冠以《文化记者的双刃剑》之名，正是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追求。在一些文章中，向云驹对文化新闻的双重效应作了充分议论，对文化记者正确发挥文化新闻的功能是有鉴戒意义的。

再次是文集中各文都有一定的深刻性。

向云驹在报界长期从事理论工作，他也爱好和习惯于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追根溯源。这使人们读他的文章常感到一种思想的洞察力。他的理论视野也是十分宽阔的，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自觉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以“美学的和历史的统一”观点

评论文艺作品。尽管其中还有可以商榷的结论，有尚需深入研究的讨论，但已取得的理论成果还是可喜的。作者或者在文化现象中寻找文化本质，或者从实践上升到理论，或者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他的许多杂文具有穿透力，他的专家访谈能从浅显的地方引出深刻的结论，他的评论多能切中肯綮，他的理论学术研究往往有独到见解和新的结论。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勤于思考和善于思考的。

总之，我以为，这本书是颇有特色颇可一读的。我乐意把它推荐给关心文化新闻、文化艺术、文化学术、文化理论、文化现状和文化发展的读者。

是为序。

目 录

序 高占祥

第一辑 特写·访谈·杂文

文化记者,用好你的双刃剑	3
——对一种“新批评”的批评	
这也是一种文化?	13
对接文化价值与市场效益的万科人	17
衣服妍媸随时眼	25
——服饰文化掠影	
让古老文明放出时代光华	30
——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新形势述评	
一个科学家眼里的文化问题	35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访谈	
从文化视点纵论经济	46
——国际经济协会副主席罗元铮访谈录	
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前途	58
——马勇访谈录	

彪炳世界的青铜文化	63
——金石家杜酒松访谈	
东方文化一奇葩	66
——与刘骏骥谈东方人体文化	
文化·科学·游戏	70
——王红旗访谈	
食文化的误区	75
儿童稚语笑不得	77
“喂”孩子还是“吃”孩子?	79
由“老外”的内行话说起	82
王苏芬拜师的启示	84
艺术家的必修课	87
道是无情却有情	90
精品效应与木桶理论	92
一个陷阱掉两次	95
文化人与文化	98
不可思议的标语	101
文人、文化与犯罪	104
出版社拒绝竞拍文稿的断想	107
广告与批评刍议	109
“猴文化”小识	112
随笔三题	116
好人坏人及其他	
庸俗务去	
一件往事	
感悟足球	124

第二辑 文艺评论

历史嬗变中的自足与突奔	131
——《民族文学》1985年小说述评	
民族文化考察散记	140
历史的辉煌与沉重	151
——读长篇小说《依然香如故》	
历史的怪圈与螺旋	158
——读赵大年的两部中篇小说	
警惕：诱惑无边	166
危险何在？	173
此实堪纪否？	177
悟性与感性的艺术	182
——读石英的游记散文	
探赜索隐 钩深致远	186
——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读后	
思想的魅力	189
——康凯杂文谈略	
领异标新《我的画》	192
古今中外眼底来	195
——读王复舜的中国画	
龙头一动金蛇舞	197
——写在1994年度“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颁奖之际	
走进心灵 揭示真谛	200
——获奖舞台艺术作品的启示	
献给孩子的精神食粮	202
——谈高占祥的《处世歌诀》、《人生宝鉴》	

纵横诗笔见高情	205
——高占祥的《诗的感言》读感	
关注人生 激扬精神	208
——评高占祥系列文化随笔《人生宝鉴》	
为繁荣民族文化鼓与呼	216
——高占祥文化论著综论	

第三辑 理论研究

围绕“中心”发展和繁荣文艺	237
——学习札记	
繁荣是原则 团结也是原则	242
舞蹈理论批评的三个层次	248
青海大通舞蹈彩盆新识	251
人的生产与艺术的起源	256
——就艺术起源于劳动而作的补正	
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	272
——先秦诸子文学理论与创作之发生学考察	
创作主体的个性与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284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理论思考之一	
论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审美机制	295
 跋	307

第一辑

特写·访谈·杂文

文化记者，用好你的双刃剑

——对一种“新批评”的批评

本文欲予评说的是一种正日益成为文艺批评中新批评样式的“新闻批评”(或曰“传媒批评”)。

从炒星说起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余热犹未退尽的炒星上来。

在过去数年间，文化新闻的误导最招人非议的莫过于由炒星而诱发青少年追星热，给社会文化和青少年健康成长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然而，迄今为止，传媒并未对此认真加以反思反省，在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后，仿佛事不关己似的又在对新的话题津津乐道。

也曾有好事者偏要对追星热问个究竟，后果又不免大出意料之外：青少年大多否认自己追歌星，无论家庭和学校都没有给予他们追星的闲暇和精神鼓励，一些专家文章也认真地指出，部分青少年追星一方面属于心理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一方面又在于社会舆论的作用，因此，青少年的追星不能责怪这些心灵稚嫩的孩子。被指责有“公款炒星”之嫌的企业界人士也在大喊冤枉，一是因为企业出钱赞助文艺晚会，只是赞助单位，不是主办

单位，主办一方往往有堂皇理由和不可抗拒的来头使企业推托不得；二是所赞助的晚会大多是综合晚会，严肃与通俗、高品位与低格调并存，主办者旨趣何在，意欲炒谁，演出费是否分配不公均一概良莠莫辨，不得而知；三是企业出钱从广告费中列支，既不违反政策和财务制度，又是企业的正常宣传行为，虽客观上为炒星提供了条件，但到底不是主要责任者。主办者也颇多异议，个体穴头表示自己小打小闹而已，难成这般气候，官办演出公司则索性拿出年度计划，让你从中找不出什么炒星的演出活动，官员们一一罗列本地种种晚会或演出，莫不与炒星无涉，而是意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传媒舆论作公正客观状，将以上种种再如实传播一番，形成一股大家都在烦炒星的气候便一了百了。这倒真是让人越发糊涂，更生奇怪了。过去仿佛是大家都在炒星的，怎么一下子又都变得了无干系起来，这追星热究竟怎么热得那般沸沸扬扬的呢？

既然其实是人人有责，方方面面都有失误和教训应该记取，莫如都从自我出发，“自查自纠”一番，免得下一次又呼拉一下热起别的什么不该那么热的东西来。

比如传媒就很可以反省一下彼时何以那么热衷于歌星排行榜，笔头、话筒、镜头与歌星大腕形影不离，什么生日、血型、星座、喜好、异癖都被大肆渲染，至于艳事轶闻更是如获至宝的话题，甚至要刻意迎逢歌星，吊人胃口，明为已婚也要说成是待字闺中或未涉爱河。

以下事实和情状是无可置疑的：传媒一方面对歌星的言行举止、身世好恶大做文章，一方面又大肆铺陈追星族发烧行状，人为地制造了一种时髦，客观上诱惑了青少年趋之若鹜；传媒对歌星事无巨细的宣传声势，构成了极强的广告效应，诱导了企业赞助歌星演唱……

在传媒炒星热潮中，人们却始终难得从中看到和听到关于通俗歌曲、流行音乐、港台文化、歌星演唱得失优劣的深入评说和科学分析，或者说传媒作为大众化文艺批评的样式，始终未能借此形成科学的批评风气，而这正是受众的潜在需要和传媒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看看时至今日那些所谓的发烧友、追星族有多少人除了知道歌星身高体重面相，还对声乐艺术和通俗音乐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呢？炒星的恶果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实在应该认真对待新闻舆论对文艺鉴赏和爱好的导向作用，十分重视文化新闻的文艺批评的功能，提高“新闻批评”的科学性。

由炒星推及开来，对我们文化新闻批评功能的实际操作与文艺批评的科学追求加以对比，结果是使人吃惊的。这里不仅误区重重，积习未改，而且无论从学术的百家争鸣还是就有批评就有反批评或批评的批评来看，仍还是一片学术的盲区。

“新闻批评”的误区

在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我国文艺事业发展上，“新闻批评”由于自身的舆论与评论的双重功能，对文艺繁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新闻批评”以其特有的快速反应，强大的舆论声势，全方位多角度连续、跟踪、深入地报道和公正客观真实的批评态度，推出了一大批新人新作，及时发现分析了许多重大文艺现象，记者队伍也涌现和活跃着大批有真知灼见、深厚学养的评论家，许多人至今还以文艺批评家知名于世。然而，文化新闻的批评意识毕竟未有普遍的自觉，许多记者甚至简单地认为文化报道的新闻意识是抗拒批评意识的，加之职业以外的专业知识的欠缺，

在新闻实践中就难免误区重重。那些拒绝批评的文化新闻，并没有因为这种拒绝而远离批评，相反则沦为一种畸态批评。

广告式批评。广告、新闻、文艺批评，三者是有若干相通之处的。广告是要广而告之，新闻是要传播天下，文艺批评是向大众通报一种艺术鉴赏的选择和臧否。但是三者的区别在于，广告是自我宣传，新闻是客观事物的播扬，批评是对他人的评骘。文化新闻中的所谓广告式批评是以上三者相通相异张冠李戴后弄出的不伦不类之物。比如年前被传媒渲染一时的某《语言大典》，某些记者根据主编者提供的材料大作文章，吹嘘它是“当代中国辞书之最”，还添油加醋地给主编者送上一顶“没有军衔的将领”的桂冠，细致述说他如何统率几十位编纂名家，“指挥若定地完成了这次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但是，事过不久，真正的专家和权威机构出来说话了。辞书出版社、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的专家们，对该“大典”逐条审阅，结论与新闻报道大相径庭。专家们发现“大典”是一部大量抄袭别人成果、滥收词目、胡乱释义、草率成书的谬误百出的伪劣之作。辞典是语言的范本，如此辞典使谬种流传，贻害人民和子孙后代，后果堪虞！显然，在这场丑剧中，我们“新闻批评”的角色不很光彩，也是被人大大地利用和愚弄了一回。在那些妄加评论的文化新闻中，记者们并未对辞典本身(客观事实)做出判断认定，而是依据辞典作者自撰的自我评论性文字成文，其结果等于是作者自己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就不仅背离了新闻标准，更是远离了批评原则，沦为货真价实的广告宣传了。问题在于这种广告宣传一旦失实失误，局面就很尴尬。这不，辞书家、出版家无不同声相斥，版权问题姑且不论，大辞典中的错讹如此之多，舆论批评毫无是非判断能力，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一部《废都》出版前的爆炒，完全也是广告式的哄抬，而它的内容又恰恰是那样的不

堪入目，这可以说是近年来“新闻批评”中广告行为带来的最令人痛心的耻辱和教训。

猎奇式批评。令“新闻批评”尴尬不堪的事近年来屡屡发生。人们还记得去年一部电视连续剧，仅仅因为它破了个先例，开了个卖版权的头，被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收购，新闻界就鼓噪不绝，算是逮着了一个新闻由头。一时间炒得这部片子神乎其神，把人们的审美期待吊得居高不下，待到播映之时，大失所望之后，真是怨声载道。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让受众深感我们的文化新闻实际上最缺少的是最基本的审美判断。

什么“首演”、“首发”、“第一”、“之最”也是“新闻批评”的热衷之道。其中也多有与事实不符者。手边有两个新例。一是最近有两位旅德青年指挥家来京举行交响音乐会。就有报纸称，某某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的《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属国内首演。数日后，著名指挥家卞祖善撰文反驳：“这首交响幻想曲，笔者曾在50年代末聆听过黄贻钧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二是年初以来，若干大小报刊相继刊出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中国将首次出版《红楼梦》程甲本。”红学界专家莫不对此感到愕然。可信的事实有：1987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向社会郑重推出过一部由启功先生为顾问的、以程甲本为底本并力求保持程甲本原貌的《红楼梦》校注本，并参加过次年的“红楼梦新书联展”，行销海内外；198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三家评本，亦属程甲本系统；1991年9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冯其庸纂校订定的《八家评批红楼梦》，并注明正文是以程甲本为底本；1992年3月，北京图书馆将馆藏《红楼梦》程甲本重新影印问世，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书名即叫《程甲本红楼梦》！所有这些就将新闻记者杜撰（其实是当事人自撰）的以为可入史册的“首演”、“首发”从当代艺术史中驱赶出去